
入世以来上海服务经济发展回顾

查贵勇¹

(上海海关学院, 中国上海201204)

【摘要】:经过多年努力,上海服务业获得较大发展,如增加值和就业比重持续提高,增加值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投资和贸易规模持续扩展,服务外包规模、结构和质量都有所提升,服务消费潜力开始释放;但亦存在问题,如现代服务业发展起伏不定,与“四个中心”建设不相匹配,劳动生产率偏低,结构偏离度偏高,增长弹性系数偏低,国际竞争力偏弱,消费相对水平偏低等。因此,上海须全面审视服务经济的发展态势,以便认清形势、面对差距、群策群力,加快发展服务经济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关键词】:上海;服务经济;成就;问题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37-324X(2013)-02-69-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即大力发展服务经济。

一、服务经济的内涵特征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在西方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渐减少,作用日渐削弱,而各类新兴、门类繁多的服务部门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正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服务经济是从产业角度对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征的把握,是指基于服务业的经济发展形态。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比,服务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在服务经济形态下,产业结构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服务业为主。^[1]

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形态中,服务产出、服务业就业、服务贸易、服务消费、服务业投资等经济活动成为具有主导或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2]恩格尔定律、马斯洛需求理论、克拉克需求层级假设均显示,服务经济的发展将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功(Kravis, Heston 和 Summers, 1982^[3])。对于践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上海而言,发展服务经济将至关重要。因此,须从产出、就业、贸易、消费和投资五方面深入进行考察。

¹收稿日期:2013 02 03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1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2YS191)和2010年上海海关学院科研启动项目(23111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查贵勇,安徽泾县人,博士,上海海关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电子邮箱:zhaguiyong@163.com。

二、上海服务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入世以来,上海服务业获得长足发展,已初步具有服务经济的特征。

(一)服务业增加值持续增加在全国具有一定优势

2012年,上海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2 060.76亿元,是2001年的4.2倍,占GDP比重首次达到国际公认的服务经济最低标准60%,也已满足“国际贸易中心”的标志之一——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达50%以上,经济增长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为101.35%和7.6%,均位居三次产业之首。

上海服务业区位商(某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与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GDP比重的比值)虽然都大于1,且走势趋稳(表1),表明上海服务业总体专业化程度较高,在全国具有相对较好的发展环境。

上海服务业GDP增长率弹性系数(某地区服务业GDP增长率与区域GDP增长率的比值)基本维持大于1,2001—2011年平均水平为1.008(表1),表明服务业在上海具有较好的发展态势,但优势不是很明显。

表1 2001—2012年上海服务业区位商与增长率弹性分析

年份	2001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区位商	1.295	1.245	1.236	1.255	1.338	1.367	1.335	1.339	1.345
增长率弹性	0.990	1.013	1.008	1.031	1.018	1.040	0.958	1.013	1.029

资料来源:2012年《上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情况》《2012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www.stats-sh.gov.cn、www.stats.gov.cn。

(二)服务业行业结构有所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提高

上海服务业行业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2001年的68.12%升到2011年的74.77%,占GDP总额的比重亦从35.68%升到43.40%。

为具体分析上海服务业各行业专业化水平,特计算服务业分行业区位商——某地区某类服务业增加值占该地区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与全国该类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服务业GDP比重的比值,结果见表2。

表 2 2004—2012 年上海服务业分行业区位商

分行业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生产性服务业	1.14	1.17	1.18	1.18	1.24	1.25	1.30	—	—
现代服务业	1.37	1.32	1.28	1.30	1.27	1.29	1.20	—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84	0.89	0.93	0.86	0.73	0.63	0.77	0.73	0.69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1.13	1.19	1.25	1.30	1.19	1.22	1.34	—	—
批发和零售业	0.94	0.98	0.95	0.89	1.23	1.25	1.28	1.28	1.26
住宿和餐饮业	0.65	0.65	0.68	0.69	0.62	0.56	0.58	0.55	—
金融业	1.79	1.80	1.72	1.70	1.59	1.68	1.64	1.74	1.65
房地产业	1.46	1.29	1.12	1.02	1.06	1.10	0.79	0.71	0.7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52	1.51	1.48	1.76	1.82	1.72	1.76	—	—
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54	1.60	1.47	1.36	1.37	1.28	1.23	—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8	1.02	1.01	0.88	0.55	0.50	0.51	—	—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47	0.43	0.54	0.61	0.51	0.49	0.52	—	—
教育业	0.73	0.76	0.82	0.82	0.66	0.60	0.59	—	—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0.75	0.78	0.82	0.81	0.75	0.74	0.74	—	—
文化、体育和娱乐	0.98	1.04	1.09	1.06	0.69	0.65	0.66	—	—

资料来源：2012 年《上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12 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情况》《2012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www.stats-sh.gov.cn、www.stats.gov.cn。

从服务业部门区位商来看，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大于 1，且持续提高，表明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且在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建设的推动下，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专业化程度最高；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区位商小于 1，且逐渐下降，表明上海航运中心建设的带动效应还有待挖掘。

（三）服务业就业吸纳功能释放，存在巨大就业潜能

2011 年，上海服务业就业总数达 621.97 万，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达 56.32%，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导产业，但还未达到国际公认的服务经济最低标准 60%。

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由 2003 年的 218.11 万增至 2011 年的 388.08 万，占服务业就业比重从 51.66% 升至 62.40%，成为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力；现代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员由 2003 年的 168.85 万增至 2011 年的 253.38 万，占服务业就业比重从 39.99% 升至 40.74%，但仍低于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还需大力发展。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劳动者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在完全竞争状态下，其等于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如果国民经济各产业是相互开放的，产业间没有人为的壁垒，劳动力可自由流动，即各产业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则通过行业收入的差异，市场可将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最终各产业的生产率会趋于一致，进而各产业的结构偏离

度会趋于零。

上海服务业结构偏离度虽起伏不定,但基本由2000年的-7.2%降为2010年的-1.37%,虽然2009年反弹至-1.73%,但完全符合产业结构趋向于零的规律,表明服务业的市场经济属性日益凸显。

此外,产业结构偏离度还表现出各个产业之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并可用以测量某一产业是否存在劳动力转入和转出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产业存在着正结构偏离度,即就业比重高于增加值比重,就说明其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其他产业比较低;如果产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则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不同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会导致不同产业工人相对工资收入的差异。由于人们追求更高的收入,就会争取进入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业,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显示,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劳动生产率会降低。所以根据自由竞争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偏离度是趋向于零的。因此,某一产业的正的结构偏离度表明该产业存在劳动力转出的可能性,负的结构偏离度表明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性。

经测算,上海服务业具有负产业结构偏离度,表明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且负偏离度不断缩小,表明上海服务业近年来吸收劳动力增长较快,已成为上海新增就业的主力军。特别值得注意,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结构偏离度为负,表明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但其负偏离度不断扩大,表明这两类服务业近年实际吸收就业能力较弱,造成这种情况存在两个可能因素:这两类服务业属于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较高,就业弹性较低;或存在垄断,致使劳动力流入困难。

如果是第二种原因,则将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因为在当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要从简单加工制造向高端攀升,这就需要高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但如果服务业国有垄断性过强、市场化程度不够,将会制约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政府应放松对民营经济的进入管制,强化竞争机制,帮助高效率的企业进行创新和扩张(刘丹鹭,2012)。^[4]

关于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还可用就业弹性指标分析。就业弹性即就业 GDP 弹性,是指在某个时期内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间的比率,即经济增长每变化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E = (\Delta L / L) / (\Delta Y / Y)。$$

其中,E 表示就业弹性,L 表示就业人数,Y 表示产值GDP,△表示增量。

一般而言,就业弹性越大,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效果就越大,依靠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作用就越明显;当就业弹性较低时,即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也不会对就业有较强的拉动。因此,大力发展就业弹性高的行业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

经测算,2001—2011年,上海服务业就业弹性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和整体经济,如十一年间平均就业弹性分别为0.441、0.112和0.222,服务业分别是第二产业和整体经济的4倍和2倍,即大力发展服务业将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

(四)服务业投资持续增长,FDI流入增长更甚

2012年,上海服务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3 949.04亿元,3倍于2001年,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达75.2%。

以地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衡量,2011年上海服务业投资额达3 452.69亿元,占总额(4 157.09亿元)比重达76.44%;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2003年的395.85亿元升至2011年的665.9亿元,占投资总额和服务业总额比重却先升后降,分别由2003年的16.14%和24.12%升至2007年的22.62%和30.57%后,此后逐步降至2011年的14.74%和19.29%;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额由2003年的1059.4亿元升至2011年的2368.4亿元,占投资总额和服务业总额比重却先降后升,分别由2003年的43.2%和64.56%降至2007年的41.01%和54.35%,此后逐步升至2011年的52.43%和68.6%,此得益于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政策性推动。

2012年,上海服务业实际利用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达126.8亿美元,7.4倍于2001年,占FDI总额的比重亦从2001年的39.26%升至2011年的83.5%,占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亦从2001年的10.94%升至2011年的20.27%,上海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提速,但还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上海还需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对外开发力度。

(五)服务贸易发展迅猛

在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的推动下,上海服务贸易获得长足发展,2011年服务贸易总额达1292.8亿美元,近14倍于2001年,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比重从2001年的13.08%升至2011年的30.72%,连续三年蝉联全国第一;占上海市货物贸易总额比重从2001年的15.59%升至2011年的29.55%。

2011年,上海服务出口达473.2亿美元,10倍于2001年,占全国服务出口比重从2001年的13.83%升至2011年的25.87%;其中传统服务(运输、旅游)出口占比从2001年的73.99%降至2010年的44.34%,表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断改善;

2011年,上海服务进口达819.6亿美元,近17倍于2001年,占全国服务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2.45%升至2011年的34.43%;其中传统服务进口占比从2001年的66.49%升至2010年的78.39%,表明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不断恶化,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传统服务贸易(如旅游、运输)国际竞争力不断弱化所致。

(六)服务外包持续发展,结构和效率得到改善

服务外包是智力、人才、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收就业能力强等特点。[5]因此,大力促进以软件外包为代表的服务外包发展,是上海提升现代服务业和软件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适应国际服务业转移趋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6]上海在服务外包业发展上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发展速度十分迅猛。

1. 服务外包规模迅速增长

2010年,上海服务外包合同金额达27.53亿美元,同比增长63.6%;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为17.53亿美元,同比增长69.2%。2011年1—9月,上海服务外包合同金额达16.02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为11.43亿美元,同比增长84.6%;而作为服务外包重要组成部分的软件外包发展势头更强——2012年1—9月,上海软件出口合同登记协议金额达14.36亿美元,同比增长40.5%;执行金额达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其中,信息技术外包仍是上海软件出口的主要方式,出口额为9.96亿美元,占比达98.2%。

2. 服务外包结构和质量得到改善

信息技术外包占主导,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占比提高:2010年,上海服务外包中信息技术外包(I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BPO,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知识流程外包(KPO, 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分别占67.9%、14.4%和14.5%,其他占3.2%,仍以ITO为主体,但KPO占比明显提高。

服务外包主体优化:2011年8月底,上海共有服务外包企业1043家,其中INFOSYS、ADP、汇丰和花旗等世界500强企业已设立亚

太或全球数据处理中心, 药明康德、贝塔斯曼等国内外知名外包企业也以上海作为重要战略部署地, 而知名全球服务外包企业包括埃森哲、IBM、EDS、优利、NCS等在上海都设有分公司。

服务外包呈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 外资成为主要力量: 2011年内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8家, 投资性公司27家, 外资研发中心15家; 至2011年末, 在上海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353家, 投资性公司240家, 外资研发中心334家, 使得服务外包主体质量不断提升。

3. 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增加且素质提升

2010年底, 上海市服务外包企业吸纳就业人员14.23万人, 同比增长3.8万人, 增幅达36.4%;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86.2%, 从业人员素质大幅提高。

4. 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来源地广泛

2010年, 上海服务外包发包地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日本、瑞士、中国香港、荷兰, 业务占比分别为34.6%、18.7%、10.2%、9.1%和6.4%。

5. 服务外包企业涵盖全市, 区域辐射和集聚效应较强

2010年上海已发展5个服务外包示范区(浦东新区、卢湾区、长宁区、闸北区和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和11个服务外包专业园区(张江金融信息、张江生物医药、南汇生物医药、浦东软件园、卢湾区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园区等), 84家服务外包重点企业和220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分布于上海市大部分区县。

其中, 浦东新区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占整个上海市的半壁江山。2011年前三个季度浦东新区企业共完成服务外包合同额7.37亿美元, 合同执行额5.42亿美元, 均占上海全市50%以上, 同比分别增长67.83%和129.42%。

6. 产业链日益完善, 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上海在服务外包发展过程中, 注重打造完成的建业连, 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以促进服务外包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 如上海市重点发展软件开发外包、研发设计外包、物流外包和金融后台服务外包等领域, 已初步形成“软件出口为主、来料加工、系统集成、整体方案和软件服务并举”的软件外包产业链。

(七) 服务消费绝对值持续增长

2011年, 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达7721元, 3倍于2001年2393元, 但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却先升后降, 从2001年的25.63%升至2006年的32.79%, 后逐渐降至2010年的29.98%, 2011年微升至30.76%, 表明上海服务消费虽持续增长, 但增速却相对慢于物质消费, 此将不利于服务经济的发展。另外, 上海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自2001年的43.4%降至2005年的35.9%后就基本维持在35.5%~36%之间, 亦从侧面表明上海服务消费支出增长缓慢。

三、上海服务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上海服务经济发展虽取得一些成就, 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否则将会影响服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现代服务业发展波动较大

2009年,上海确定推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总体目标,现代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与商业服务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虽由2001年的50.44%升到2009年的54.81%,其后却持续降到2011年的51.71%,下降3个百分点;占上海GDP总额亦由2001年的26.42%升到2009年的32.53%,此后持续降到2011年30.02%,降低2.5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虽然区位商已逐步下降至低于生产性服务业,表明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于生产性服务业,即《推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总体目标》的政策效应受到制约;其中,房地产业区位商降至0.72,表明在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下,上海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已下降,经济发展方式有所转变,质量有所提升;但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与体育和娱乐业专业化水平最低,表明上海消费服务业发展滞后于生产性服务业。

为具体分析服务业各行业发展优势,特计算服务业分行业GDP增长弹性系数——某地区某类服务业GDP增长率与该地区服务业GDP增长率的比值(表3)。

表3 2001—2012年上海分行业服务业增长弹性系数

服务业分行业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95	0.91	0.79	0.99	1.29	0.94	0.50	0.08	-0.70	2.81	0.56	0.47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93	1.90	2.11	0.93	1.58	1.44	1.02	1.43	0.69	1.96	1.85	1.56
批发和零售业	1.67	1.77	0.95	0.59	1.14	0.85	0.70	1.73	1.11	2.74	1.31	1.42
住宿和餐饮业	0.83	1.40	1.66	1.80	1.01	1.28	0.53	0.27	-0.25	1.19	-0.03	0.49
金融业	-0.97	-0.89	0.03	0.96	0.83	1.78	2.01	1.09	2.04	0.89	0.98	1.19
房地产业	2.17	2.40	1.45	1.53	-0.26	0.07	0.63	-0.74	2.21	-5.14	-0.25	-0.4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14	3.09	1.86	1.43	1.20	1.02	1.67	2.49	0.30	2.75	1.66	
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05	0.70	0.84	0.63	1.99	0.61	0.83	1.82	1.07	0.89	1.05	
居民和其他服务业	2.54	3.62	2.60	0.70	0.77	0.27	-0.22	-0.04	0.56	1.61	0.33	
教育	2.00	2.13	2.64	1.03	0.98	2.94	1.01	1.43	0.97	2.19	1.33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49	1.28	1.93	0.84	1.32	0.78	0.80	1.03	0.55	1.09	1.09	
文化、体育和娱乐	1.47	2.21	2.19	0.60	1.54	1.00	0.74	0.35	0.42	1.12	2.07	

资料来源:根据2012年《上海统计年鉴》、《2012年上海经济运行情况》整理而得, www. stats-sh. gov. cn.

表3显示:上海服务业分行业增长弹性系数最高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具有较大的发展优势;最低的是房地产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与仓储及邮政业。其中,房地产业主要是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果;而金融业、交通运输与仓储及邮政业则与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相匹配。

(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亟需提升

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还较低,全员劳动生产率到2009年达152 331元,首次超过第二产业141 687元,但2010年又以3 045元的劣势位居次位,随后2011年又以2 514元的微弱优势位居第一,表明上海服务业生产率波动不定,且增速缓慢于制造业,致使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仅由2001 年的30.15%升至2011年的32.34%,远低于名义价格计算的数值,而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数值则更低,2001年和2011年分别仅为24.21%和25.18%。这表明上海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提升更多的来自服务产品价格的上升,而非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鉴此,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上海,在提升服务业总量的同时,更应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避免出现经济发展结构性减速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不应通过过多干预盲目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而应通过体制改革,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发展生产服务业实现经济转型(裴长洪,2012)[7]。特别是在当前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下,将资源投入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服务业并非明智之举,不仅浪费资源,且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从而不利于促进产业攀升至价值链高端,这在我国部分“服务外包基地”及相关产业集聚区已有所显现(刘奕和夏杰长,2009)[8]。因此,生产服务业应专注于技术密集型或R&D密集型行业,提供金融中介服务、会计、法律、半导体芯片设计等专业的知识技术解决方案,促使生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Castellacci,2008)[9]。

2007—2011年,此状况虽有所改善,如CPI指数持续高于其中包含的服务项目价格指数(2007年和2011年分别高出2.3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表明服务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远低于实物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但2012年CPI(2.8%)又低于服务项目价格指数(3%),显示上海还需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三)生产性和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偏离度偏高

虽然上海服务业整体结构偏离度不断缩小,但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结构偏离度却不断扩大,分别由2003年的-3.36%和-4.97%降至2006年的-1.24%和-1.18%,但随后又逐步扩展至2011年的-8.26%和-7.07%,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些行业垄断较为严重,劳动力缺乏流动性。

(四)服务业投资中住宅比重偏高

上海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住宅投资,从2001年的466.71亿元升至2011年的1 403.1亿元,占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由2001年的35.8%升至2004年的44.6%,随后降至2009年24.1%,但随即迅速升至2011年的37.4%。这不利于服务业行业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房地产调控趋紧背景下。

(五)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

为衡量上海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特计算上海服务贸易、传统服务贸易和新型服务贸易的TC指数(竞争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计算结果表明:

1. 2001—2011年,上海服务贸易整体TC 指数从-0.030降至-0.268,且一直为负,表明处于国际竞争劣势,并呈恶化趋势。

2. 2001—2010年,上海传统服务贸易TC 指数从0.023降至-0.472,已连续六年为负;其中,旅游服务表现更为惨烈,TC指数从0.223降至-0.621,运输服务从-0.04降至-0.357,严重削弱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

3. 2001—2010年,上海新兴服务贸易TC 指数从-0.155升至0.241,已连续六年为正,表明已由国际竞争劣势转为竞争优势,且优势不断增强;其中,金融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与文化及休闲服务表现抢眼,TC指数分别从-0.184、0.131和-0.639升至0.494、0.502和0.41,但金融服务是从2009年起由国际竞争劣势转为竞争优势,其优势是否能持续,还有待时间验证;最值得注意的是,2001—2010年,保险服务TC指数却从-0.015降至-0.871,国际竞争劣势不仅未得到改善,且持续恶化。其他分行业TC指数虽有所波动,但趋势未改,如通讯、建筑、计算机与信息基本维持原有国际竞争优势,而版权与专利许可服务则维持原有国际竞争优势,

但通讯行业2002—2008年凸显竞争劣势, 值得分析其成因。

(六) 服务消费相对水平较低

2003—2011年, 若以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为衡量指标, 低收入户有二年超过当年总体水平、中低收入户零年、中等收入户四年、中高收入户二年, 高收入户九年; 若以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衡量指标, 低收入户有九年超过当年总体水平、中低收入户七年、中等收入户六年、中高收入户二年, 高收入户零年。

2004—2011年, 以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对可支配收入的弹性为衡量指标, 各年总体平均弹性均大于0.5, 即服务性消费支出会随着可支配收入提升而提高; 其中, 低收入户有三年大于1 (即富有弹性)、中低收入户四年、中等收入户四年、中高收入户三年, 高收入户二年; 低收入户有三年超过当年总体水平、中低收入户四年、中等收入户三年、中高收入户二年, 高收入户一年。

因此, 上海欲提升服务消费, 在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时, 还需调节收入分配, 努力扩大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 即壮大中产阶层。

四、结论

经过多年努力, 上海服务业获得较大发展, 如增加值和就业比重持续提高, 增加值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投资和贸易规模持续扩展, 服务外包规模、结构和质量都有所提升, 服务消费潜力开始释放; 但亦存在问题, 如现代服务业发展起伏不定, 与“四个中心”建设不相匹配, 劳动生产率偏低, 结构偏离度偏高, 增长弹性系数偏低, 国际竞争力偏弱, 消费相对水平偏低等, 特别是结构性问题亟待调整和优化, 否则将制约甚至阻碍上海服务经济发展、“四个中心”建设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张祥. 服务业成为引领创新的主导力量[N]. 国际商报, 2011 8(A2).
- [2]程大中. 服务经济的兴起与中国的战略选择[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 11.
- [3]Kravis I., Heston and Summers. World Product and Incom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Gross Produc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4]龚强、李涵、张彤. 经济转型下的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J]. 经济研究, 2012(6): 156-159.
- [5]教育部、商务部. 关于加强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 www.mofcom.gov.cn, 2009-3-18.
- [6]吴颖. 上海聚焦三大领域软件外包[EB/OL]. 东方网. www.eastday.com, 2011-10-20.
- [7]裴长洪.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服务业发展. 2012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论坛[D]. 西南财经大学, 2012-5-12.
- [8]刘奕, 夏杰长. 全球价值链下服务业集聚区的嵌入与升级——创意产业的案例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12): 56-65.

[9] Castellacci F. Technological paradigms,regimens and trajectories: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in a new taxonomy of sectoral patterns of innovation[J].Research Policy,2008.37(6 7):978 994.